

## 前言

在訪談的「大陸新娘」中，與小娟特別投緣，每次返臺時要是有空總會去看望她，或是和小娟及劉伯伯一家人吃頓飯。要是沒空也會給小娟掛個電話，問問她的近況。當然每次和小娟聊天前，總要先陪劉伯伯敘敘家常後，才能和小娟在電話中聊天。

小娟的臺灣配偶劉伯伯已經八十八歲，妻子於五年前過世，六個兒女，三個定居美國，另外留在臺灣的三個子女也各自忙於自己的家庭與工作。年近九十歲的劉伯伯，雖然耳聰目明，身體健康，他說：「我需要一個二十四小時照顧的看護。」於是在一個老兵的穿針引線下，前年底娶了一位三十多歲的杭州姑娘為妻，來照顧他的晚年生活。小娟原本有個令人羨慕的幸福家庭，一個成功經營鄉鎮

# 傭人抑或太太？ 大陸新娘在臺灣案例研究， 女性勞動力的跨境遷移

韓嘉玲

企業工廠的先生，還有個可愛的女兒。小娟說不知是否應驗了大陸的順口溜「男人有錢就變壞，女人變壞就有錢」，自從商場得意的先生與一位從貴州來浙江打工的年輕女子交往以後，這個家庭就支離破碎了。小娟說將近一年多的折磨，自己甚至經歷了割腕自殺的痛苦。她說當時萬念俱灰，離婚時什麼要求也沒提出，唯一要了女兒的監護權。可是等離開先生後，才知道每個月的房租，女兒的生活費、教育費都是一大筆負擔。她原來上班的公司倒閉，自己經營的小店鋪也難以維持。所以當劉伯伯來到杭州時，希望找一個家庭看護，說好每個月給二六、〇〇〇臺幣，但必需以結婚的方式，才能來臺灣。於是她就很快地做了決定，一則想離開那個傷心地，二則希望給女兒好的物質條件。

小娟常常問我，我這樣做是否錯了？她說自己每天不敢想問題，就是好好照顧劉伯伯，把家事做好，其餘的時間就靠看電視打發，唯有這樣才能把這日子打發了。她最不高興劉伯伯每次出門的

時候，總要向人介紹，誇耀這是我的大陸新娘。小娟說剛開始覺得挺尷尬，日子一久，也覺得麻木了。

她說「我不知道自己是傭人還是太太？」如果是傭人，每周還有放假的日子，有交朋友的自由，在這兒是二十四小時全天候。要是太太，在這個家，我只能處處考慮他的喜好與要求，甚至買個自己想吃的東西，也要自己掏腰包。我也是女人，也希望有人疼愛，有人憐！

像小娟這樣的「大陸新娘」（註一），係指原本戶籍大陸地區的婦女嫁給戶籍臺灣地區的男性，是自一九八七年臺灣解嚴及開放臺灣民眾赴大陸探親以來，隨著兩岸經貿、文化交流後出現的一批特殊群體。兩岸婚姻自臺灣開放大陸探親以來，較與其他地區與國家的人數相比急劇增加。自一九九四年到二〇〇〇年泰緬新娘有一〇、〇二八人、印尼新娘二〇、四二五人、菲律賓新娘八、七八七人、越南新娘三九、四一九人（註二），而大陸新娘已經超過十三萬人（註三）。

## 一、兩岸婚姻的類型

隨著兩岸交流的頻繁展開及兩岸的經濟、社會、文化等因素，大陸新娘人數還會以更快的速度增加，因此這批新移民移入而滋生的社會問題以及權益問題也日益引起人們的重視。

兩岸婚姻不僅人數眾多，情況也較在臺的越南新娘及印尼新娘

複雜，（註四）如果按照兩岸關係條例以入境的類別來劃分，可將她們分為定居、居留、探親及團聚等身分。本文借用 Max Weber 中 Ideal Type（理想型）的概念，嘗試從她們的婚姻的實質、形式及家庭的功能，將她們歸納為以下四種類型，以便於對這個特殊群體特徵與現象進一步瞭解。此四種類型，是為了研究說明而進行的分類與歸納，每個案例並非只對應一個類型，有的案例與其他幾種類型有交疊的情形。

## 老夫（老兵）少妻型

此類型大陸新娘是一個非常特殊並受到議論不休的群體，相對於其他外籍新娘，大陸新娘中老夫（老兵）少妻的現象特別突出。

老兵（多數是一九四九年內戰時期被國民黨從農村拉夫來臺的）是臺灣社會弱勢及特殊的群體（註五）。他們一方面處於臺灣政經社會地位的底層，一方面認同權力的意識形態並受到某些優惠保障（註六）。

老兵早年受「反攻大陸」政策的限制，未婚來臺的士官兵在部隊不能結婚。到一九五六年以前只有年滿二十八歲的軍官才能結婚，一九五九年以後才允許年滿二十八歲的士官結婚，直到一九六一年後年滿二十八歲的士兵才允許結婚。等到他們退役自謀生活時，往往又無財力成家立業，而且人地生疏（由於他們缺乏社會系統或親屬支援，想在臺灣立足就業很困難），找尋物件極為困難，因

此老兵的未婚比例相當高。結婚的物件往往也是處於臺灣社會邊緣地位的婦女（如貧苦、離婚、喪夫、殘疾者、養女、娼妓）（註七）。

從一九八七年發起「外省人返鄉探親促進會」開始，他們是臺灣第一批踏上回鄉探親的人群（註八），因為當時外省人裏，有職務的公務員是禁止到中國大陸探親屬的。老兵返鄉的各種故事在八〇年代末期至九〇年代初，是臺灣人們茶餘飯後所樂道的話題。

「少小離家老大還，鄉音無改鬢毛衰」是老兵返鄉的真實寫照。離別了老家近四十年，老兵們雖然在臺灣社會並不富裕，但是挾持著臺灣經濟奇蹟的優勢及統戰的背景，他們返鄉時多被地方政府待為上賓，又能給家鄉親友攜帶三大件、五小件，一定程度上滿足了他們「衣錦還鄉」的願望。他們往往將在臺灣多年辛苦攢下來的存款，返鄉時一夕之間散盡。

根據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於一九九六年對五七四、四〇六個老兵的調查，其中六四・三%的老兵年齡在六十五歲以上。他們的婚姻狀況，有高達一八・四%老兵未婚（與臺閩地區男性老人七・九%相差較大），配偶死亡的占一二・五%。（註九）這些曾經在抗日戰爭、國共內戰中賣命沙場，在臺灣建設中胼手胝足的老兵，如今都已近七八十歲，他們中許多人沒有正常的婚姻與家庭生活，更沒有子孫承歡膝下。

特別是那些未婚、孤單生活的老兵，在晚年殘燭之時，無人照顧，雖然富裕的臺灣開放了外勞以從事家務服務，但對這些沒有經濟能力及語言能力的老兵們來說，他們無法像臺灣其他的中產階級

一樣聘請菲傭，來照顧他們的晚年生活。

據退輔會的調查，「散居及外住的老兵中，七三%在中國大陸親屬尚健在，親屬主要是兄弟姐妹。七六%曾返鄉探親，平均返鄉二・七次」。可見他們大多返過鄉，並和中國大陸有著比較好的聯繫（註十），於是他們採取了「菲傭替代法」，從老家一般在中國大陸的農村或小城鎮給自己找個媳婦回臺灣。

前一陣子傳為美談的八十六歲得子的榮民黃錫充，他在六年前回老家探親時，在親友的介紹下，娶了同鄉楊華林為妻，兩人相差五一歲，當時黃錫充已經八十歲。黃錫充說原來娶妻的目的，「是為的要個伴，照顧自己的老年生活」。（註十一）

因此，老兵不僅成為兩岸婚姻中主要的人群，同時還扮演了重要的媒介角色。他們或者是自己，或給兒子介紹，或給鄰居、老友牽線搭橋／做媒。

在老兵的示範作用下，其他喪偶的老伯伯在朋友的攪惠下，也興起「老來伴」的念頭。

這些老夫少妻型的大陸新娘，大多是中國大陸離婚的婦女或處境不利（如下崗／貧困）的婦女，她們由於現實生活的壓力，常常以結婚為改變命運的重要渠道。根據筆者訪談的八個老夫少妻型案例，無一例外都是離婚的婦女。

根據中國大陸的調查，近年來離婚比例呈升高的趨勢，特別是中年婦女。同一九九〇年人口普查相比，在十五歲以上人口中，一九九四年離婚率由一九九〇年的五・九%增加到七・一%，一九九

○年離婚比例最高的是五〇—五九歲組，為千分之一〇。三〇—三九歲組的離婚比例為千分之七·六。一九九四年離婚比例最高的是三〇—三九歲組，為千分之一〇，比一九九〇年同年齡組的七·六高出二·四個千分點（註十二）。

中年婦女離婚現象的增多，意味著單身母親不僅面對來自家庭的、社會的以及經濟方面的種種壓力，特別是還要單獨面臨未成年子女的扶養與教育問題。這些選擇遠渡重洋，想改變自己命運的大陸新娘，按他們自己的說法，「我們是不安分（不安於現實）（註十三）的女人」。「我們的目的，就是要改善生活，特別是子女的生活。為了孩子，再苦我也必須忍呀。」她們往往將婚姻作為她們進入臺灣勞動力市場的方式。由於臺灣的法令規定，使得她們都是以團聚／探親的方式來臺，一旦先生死了，就要立刻遣送回大陸。由於名額的限制，往往要十年左右（最新規定只要四年）才能排上隊（還必須有兩年的居留），而老兵們的明天確實不可知。所以這些婦女的明天也是「未知數」，因此，她們除了照顧臺灣配偶的日常生活外，往往找機會打工，拼命存錢，作為重返大陸的生活費及資本。一般她們都會想辦法在大陸老家買房子，為以後返回大陸做打算。

一個來自上海的離婚女工，剛嫁到臺灣不久丈夫就病危，她在基隆的長庚醫院廢寢忘食地照料他，終於將臺灣配偶從死亡的邊緣搶救回來。醫院裏的人都很感動。她感慨地說「這也是為了自己」。

這些離鄉背井的離婚婦女，一方面是從子女的需要，為了讓他們過上舒適的生活及接受良好的教育，而犧牲自我；另一方面是因

離婚「被拋棄」而採取自我放逐的方式來發泄心理的痛苦。

## 生兒育女型

傳宗接代是中國人的傳統，對於這些去大陸尋找結婚對象的臺灣配偶，他們主要的目的也是結婚生子，好完成一樁人生大事。一般他們結婚時，大都已三〇—四〇歲以上。此外，臺灣在剛開放大陸配偶來臺時，大陸配偶須結婚滿二年，才能來臺探親，但是一旦生育孩子，就無需等待二年，可以立即辦理來臺。這些因素都使得大陸配偶在結婚後，必須很快生育。如小陳談到「來臺前我想出國沖昏了頭，為了早來臺灣，婚後很快就生下孩子」。這些生兒育女型的婦女，如果不是臺灣配偶生活太窘困，在沒有取得居留權或定居以前，一般不敢冒著被抓的風險而打工。因為一旦被抓，將立刻被遣送離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黑龍江新娘劉雲香。由於丈夫罹患精神病而擺地攤維持家計，由於被人舉報而遭到遣送出境。

（針對本類型的大陸新娘，她們在臺的家庭生活與適應問題將在下節討論）

生兒育女型的婚姻，一般有以下幾種認識的渠道：

自由戀愛。由於臺商西進，因此給兩岸婚姻創造了許多的空間及可能。根據行政院의 調查，約有四〇萬的臺商在大陸投資，投資額達八〇〇億美金。僅上海一地就有二十萬的臺商，因工作與生活上的關係，日久生情、近水樓臺而造就了許多兩岸婚姻。（臺商西

進而產生的兩岸婚姻，由於有一定交往的基礎，一般說來婚姻較美滿。）

親戚朋友介紹。這是兩岸婚姻的主渠道。根據個案的調查，雙方認識的渠道，以親友介紹為主，這類婚姻由於多半是借去大陸旅遊及探親的機會，認識女方，因此彼此交往的時間一般不長，除非臺灣配偶在大陸工作，雙方才有較多的來往時間。此外，大陸新娘本人也加入了介紹的行列。常常是一個介紹一個，十六個案例中有一／三的人介紹了自己的親戚、朋友嫁來臺灣，其中有一人，曾先後介紹三個四川同鄉來臺。這與其它的跨國／境移民有相同的情況，是符合移民的「連鎖效應」理論的。

仲介相親。婚姻仲介一直是外籍婚姻中不可或缺及推波助瀾的重要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兩岸婚姻中，仲介組織發揮的作用在最初階段，作用較小，然而目前他們的作用逐漸加大。這幾年來看到兩岸婚姻的趨勢，由仲介業者組團去大陸相親逐漸增加，不少人紛紛加入這個利多的行業。這些仲介業者往往從商業利益出發，不考慮兩岸婚姻所存在的種種困難與壁壘，將嚴肅的結婚大事與旅遊結合成「桂林山水浪漫情，遊山玩水定真情」（註十四）。從臺灣的廣告可以看到大陸新娘與外籍新娘不加區別的，一律被包裝成具有「美麗、賢淑、勤儉、持家；溫柔、嫺淑、勤儉、乖巧」的特性，以符合臺灣男性心目中好妻子的需求。（註十五）

## 留守型——在大陸生活的大陸新娘

由於臺商在大陸工作的關係，這些婚姻大多是「近水樓臺先得月」的模式。許多大陸新娘在臺商所在的公司或工廠任職，這些大陸新娘常常都扮演著管理及「輔佐」臺商打入大陸「關係網」的角色。總之，與在臺的大陸新娘相比，她們的生活境況要好得多，至少她們生活在自己所熟悉的環境中，在婚姻關係中處於較有利的地位。

這類型大陸新娘絕大部分時間住在大陸，偶爾來臺。因此不在本文的研究範圍內。

## 假結婚真打工類型

二〇〇〇年六月十九日在英國多佛爾港發生的五十八名中國大陸偷渡客慘死事件，說明了中國大陸沿海，特別是福建一帶出國打工蔚然成風。

福建姑娘為何選擇「嫁」到臺灣呢？根據筆者在福州的田野調查：「由於福建與臺灣的距離和血緣上的親近，交易成本較低。嫁到臺灣最容易也最便宜，假結婚只要五萬人民幣。」嫁到其他地方比較麻煩，收費也相應水漲船高。

九〇年代以來，在福建、廣東沿海，有數不清的大陸馬仔（福建蛇頭的別稱）在農村到處尋找「顧客」，當他們找到一定的「貨源」時，就發傳真通知臺灣的蛇頭（註十六）。蛇頭便將臺灣男人／遊民帶到大陸充當假老公，這些假老公便靠著賺取每個月的傭金為生。

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這些經由蛇頭引進的「假結婚真打工型」的「大陸新娘」，人數急劇增加。據警方的估計約有二萬名左右大陸女子以假結婚方式到臺賣淫，根據內政部警政署統計，僅二〇〇一年在臺灣，就有二〇一二位中國大陸婦女被查獲從事性交易。

這裏有必要澄清兩個問題：其一是這類型「假結婚真打工型」的大陸新娘是否都是從事「真實淫」的性服務工作，還有多少只是嚮往臺灣高工資，來臺從事其他行業的工作（註十七）？據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查獲大陸及港澳地區人民合法入境與國內非法工作或活動情況調查表》中，二〇〇一年共查獲八七一一人，其中女性七〇五人，從事賣淫的有三三三人（占總數四五・八一％），從事色情工作的十七人，非法打工及其它的三六五人（占總數五一・七七％）。可見即使根據臺灣的官方統計，在假結婚中，並不全然是賣淫，有超過一半以上的女子，從事非色情行業的工作（註十八）。這印證了本文所論述的「假結婚真打工型」大陸新娘，主要還是「嚮往」（註十九）臺灣的高工資而來臺淘金的姐妹。但在臺灣媒體的炒作報導下，如「大陸新娘，八成來賣春」、「大陸姐妹渡臺賣春暢行無阻」（註二十），《大破淫窟查獲大陸妹》的聳動標題（註二十一），將大陸新娘大陸妹與賣淫女劃上等號。不僅汙名化了大陸新娘，也反映了臺灣部分媒體借此妖魔化中國大陸及大陸婦女的心態。

其二是這些被查獲從事性交易的大陸婦女，有的是通過偷渡來臺，有的是借由結婚的渠道進入臺灣。臺灣媒體的報導，普遍認為以「假結婚真實淫」的大陸新娘，「大部分原本就是大陸沿海等地的

酒店小姐，來臺只是重操就業」（註二十二）。據臺灣終止童妓協會（ECPAF Taiwan）從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到一九九九年十二月止，共接觸到的五四五位的外籍婦女（包括大陸婦女）中，其中被迫或被誘來臺從事性交易的有一九一人，占調查總數的三五％（註二十三）。可見「來臺賣淫的大陸女子都從事過色情行業」這樣的說辭，預設了這些婦女是事前預知，是心甘自願來臺賣淫。她們來臺賣淫只是為了賣更高的價錢，普遍造成一般人心理對她們的歧視，將責任推向所謂的「大陸妹」單方面。此外，更掩蓋了不少大陸無知婦女，被兩岸人蛇控制、拐賣，被迫賣淫的血淋淋不法事實。

從福建的田野調查得知，她們中有的遭騙婚來臺，迫於無奈才下海賣淫；有的來臺後被逼償還清蛇頭的仲介費而被迫賣淫。同時，由於臺灣法規對大陸人民來臺的嚴格限制，使得嫁到臺灣的大陸婦女，她們入臺及在臺居留手續，全部需由男方來辦理，這就加強了蛇頭對大陸新娘的控制，在人生地不熟的環境中，她們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可見「來臺賣淫的大陸女子都從事過色情行業」這樣的說辭，推卸了臺灣社會成為亞太地區的「淫運中心」的共犯結構。

## 一、大陸新娘在臺的家庭生活與社會適應

絕大部分的大陸新娘來臺前，對來臺後生活會面對什麼樣的生活與環境，所知甚少。基本上來臺前都是非常積極的態度。當然這

與有些臺灣郎吹牛吹過頭，有的大陸新娘卻將臺灣郎戀愛時的甜言蜜語當真有關。

「當回臺灣探親時，想像中的自用大轎車、別墅、菲傭、天天逛百貨公司、吃大餐：全都變了樣，這時才知道老公不過是公司的中級幹部，不是老闆，更不是不得了的好錢人；有的人還有貸款要付，還有公婆要奉養。真是被老公騙了！」這是上海老婆普遍的結論。作為臺灣婦，反而要開始省錢，要節衣縮食，要開始搭公車，老公不再體貼，不再有求必應，現實和理想的差距越來越大。（註二十四）

這還不算差的，有的大陸新娘來臺後，發覺先生並不如他們所描述的情況，而只是靠養老金生活，別說轎車、別墅了，有的連自己的房子都沒有，而只住在臨時搭建的違章建築中，這時再大呼受騙或後悔，已經是生米煮成熟飯，為時已晚了。

大陸新娘在臺衣、食、住、行等方面的適應，基本上沒有問題。雖然臺灣用繁體字，她們慢慢也能適應，就是與婆婆的溝通，不會用閩南語，溝通上有點困難。

她們在臺生活所面臨的最大困難是一她們很難進入臺灣社會。因為她們在臺人地生疏，缺乏社會系統與親屬支援。大部分又不能「在臺工作」臺灣政策規定必需持有居留權以後才能參加工作（註二十五）。因此她們缺乏臺灣人與臺灣社會交流的通道。她們在臺灣很難有自己的朋友，認識有限的幾個人，大部分是先生的親戚與朋友，但卻很難將家務事與不順遂的心理話與他們溝通。即使鄰里間

也很少來往，因為她們多少帶著「大陸妹」是「愛慕虛榮」是「為了錢」，嫁到臺灣的看法。或者被認為是從「貧窮」地區「買」來「富裕」地區的媳婦，一位遠從杭州嫁到南投農村的大陸新娘委曲地訴說。嫁給榮民的楊女士說「我們在臺灣沒有親戚朋友，只有鄰居中的兩、三個同樣是大陸嫁來臺灣榮民的大陸新娘，我們的生活範圍就是這樣。到臺灣六年，除了去大賣場買東西，沒到其他地方玩過。」（註二十六）

由於她們大部分不能工作，又缺乏參加社會活動的機會。也沒有什麼朋友，絕大部分只能在家帶孩子及做家事。特別是生兒育女型的大陸婦女，往往扮演著傳統家庭婦女的角色。根據一九九七年陸委會的調查，大陸配偶平日主要的活動是料理家務（七八・一％），帶孩子（六二・五％），看電視、報紙（五三％）及工作（三四・六％）。（註二十七）

在救總大陸配偶生活輔導營留下了她們的心聲，「與每一位大陸新娘一樣，陌生的環境、心靈的孤寂、無形的壓力，我曾經懷疑是否有人知道我們的存在，是否有人瞭解我們的痛苦」，「不遠千里來到臺灣，為愛而接受這裏新的生活，空虛寂寞的生活，讓我對生活失去了信心」，他們的社會邊界就是家庭，他們很少有社會生活，社會生活常常就是家庭生活。

雖然兩岸有相同的語言及文化，使得在剛談戀愛與交往時較容易相處及溝通。但是由於中國革命（一九四九年）後的新傳統及兩岸近四十年的分離，特別是在對待兩性關係上的差異，使得兩岸婚

姻存在著很大的分歧。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婦女參加工作的看法。她們強烈地認為「婦女一定要有經濟權，不能伸手要錢」。一位四川來的大陸新娘原來在政府部門擔任公職，由於對大陸行政部門大鍋飯的工作，感到厭煩，希望換個環境到臺灣開展新生活。沒想到來臺灣後不能工作，對自己七年在臺灣的生活，她描述是「整天就守著這片天空——廚房到客廳」。她有時偷偷去打工，只是為了掙零花錢。她說「沒有工作，事事要伸手和先生要錢，甚至連買衛生巾、棉襪都要伸手」。有種寄人籬下的感覺。

成都來的女教師B女士，先生家庭環境不錯，她堅持一定要出去打工，那怕是被遣回大陸。她認為如果不工作，就永遠無法認識這個社會。

知名的大陸新娘賀順也說到：「由於自己沒有掙錢，花丈夫的錢就覺得不硬氣，「你的手心朝下，我沒有自尊，我的手心朝上，更沒有自尊，」她們希望自己也能參加社會，希望這個家庭也有自己賺來的錢」她們在矛盾中掙扎——做家庭主婦不甘願，走入社會臺灣政策不允許。自尊、自卑交織在一起，埋下矛盾的癰患。

（二）婆媳關係。婆媳矛盾是個永恒及普遍的難題，特別是在中國人的家庭關係中，而婆媳矛盾在兩岸婚姻中特別突出。由於臺灣新郎多半都是臺灣社會的中低收入者，在幾個訪談的案例中，發現許多生兒育女型的大陸新娘，她們多數都與公婆一起居住，而不是核心家庭的模式。由於她們大部分不能工作，在臺灣又沒有可談

心的朋友，每天面對的就是婆婆，如果婆媳矛盾，往往容易造成婚姻的破裂。廣西南寧的N女士與先生、婆婆的矛盾，最後導致了離婚。他們的矛盾在「要伺候公婆」。她認為「公婆說得對的可以聽從，公婆不對的為什麼要聽從？」但他先生堅持不管父母對錯，都應聽從。

此外，臺灣的公婆往往帶著一般臺灣人對大陸新娘的猜忌，認為大陸新娘都是為了錢而嫁到臺灣，是來臺灣享受「榮華富貴」。幾個案例都顯示了大陸新娘初到臺灣時，往往為了打長途電話回大陸，被公婆認為浪費金錢而鬧得不愉快。臺灣人對大陸人一定程度帶有「共產主義大鍋飯」的認識，在臺商中對大陸人「懶惰」的看法非常普遍。如果大陸新娘在做家事時不動快，臺灣婆婆往往認為大陸新娘「懶惰」。這種情況與韓國婆婆對待從中國大陸朝鮮族嫁到韓國的大陸新娘非常相似。（註二十八）

臺灣社會對大陸新娘（包括對其他外籍新娘）的污名化，如貪圖臺灣的榮華富貴、可憐、愛滋病、買賣婚姻、逃跑、賣淫等的印象，也造成了對大陸新娘的猜忌。如不守婦道、疑神疑鬼是部分臺灣先生的普遍現象。一位福建的大陸新娘，由於在臺生活不適應，常到另一位大陸同鄉女朋友家聊天，有一次時間太晚，就住宿在朋友家，回去後無論如何解釋，先生和公婆就是不相信。最後終以離婚收場。

（三）對家務勞動的認識。中國大陸長期受毛澤東「婦女能頂半邊天」觀念的影響，在城市婦女的觀念中，做家務是夫妻兩個人



的事，而不僅僅是婦女一個人的工作的看法已非常普遍，這常常成為臺灣婆婆看不順眼的地方。這是訪談案例中，她們普遍的話題。連家戶喻曉的賀順順亦然。她的婆婆就很看不慣順順讓先生做家务，認為「男人是做大事業的，怎麼能幹這樣的事情？」婆婆常常給她的大陸媳婦灌輸「男人是天，女人是地」的想法，就連凌峰也說：「臺灣是個傳統的社會，以男人為中心，男主外，女主內，女人在家相夫教子，是天經地義的事。」

這就是臺灣婆婆與配偶所希望的大陸新娘的形象，其實這樣的看法及觀念在臺灣早已落伍了，也與臺灣目前的家庭關係與女性觀念有很大的差距。

## 三、政策建議

儘管大陸新娘是我們臺灣人的媳婦與臺灣子女的母親，但是我們的社會卻不能真正把她們當成我們的一份子。長久以來，存在於兩岸人民之間的隔閡、猜忌，使親如夫妻者亦難免互不信任甚或猜忌。臺灣作為一個開放、民主及移民的社會，不僅在制度上，同時在人民的觀念上，應該對新移民有寬廣接納的社會機制與胸襟。

希望政府有關方面以後對這個日益龐大的群體的瞭解，不應該侷限在管理的層面，應加強在認知面的深度及廣度，以便於我們對大陸新娘群體的進一步瞭解，因為這已經不是可以迴避的社會問

題了。此外，在訪談與調查過程中，發現臺灣社會對中國大陸的瞭解與認識非常片面，包括處理家暴問題，社會工作人員都對大陸新娘存有一定的偏見，認為她們不值得同情，理由是「她們太強勢」、「她們一點都不可憐」。因此，也應對社會工作人員進行有關中國大陸政治經濟、社會背景（包括一九四九年以來的婦女狀況）的培訓。

大陸新娘由於社交圈狹小，生活寂寞，常常孤獨無助。情況厲害的案例中，有人甚至導致憂鬱症。她們一般對於臺灣社會資源方面認識有限，以致於她們遭遇困難時，出現不知道向誰求助的情況。建議政府部門或 NGO 應有專門的社會工作人員定期訪視她們及其家人，主動告知相關的法律與社會政策，讓她們真正有機會融入臺灣的社會。

目前的社會工作往往是針對大陸新娘這個群體，然而婚姻事實上是兩性關係的互動過程。因此建議以後的生活營也應針對臺灣配偶，特別是臺灣先生，輔導他們改進對兩性觀念的認識。臺灣配偶常常保持著高高在上的心態，自以為是的觀點，這都對原本基礎就不穩定的婚姻再添變數。

大陸新娘在婚姻生活及職場是否遭受更多的歧視和虐待，是個值得關注的問題，特別是家庭暴力及子女監護權問題亟待解決，從個別案件來看似乎情況相當嚴重。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在一九九九年六月到二〇〇一年六月，共接獲外籍新娘（包括大陸新娘）案件五十一件。其中大陸與外籍新娘根本的差距，大陸新娘因身分名額的受限，往往需要多年等待配額以取得臺灣的身分

證，且需要配偶或二親等作為保證人（外籍新娘無此規定），但大陸新娘遭受暴力後，往往不敢聲請保護令或離家暫時躲避，因擔心關係破裂後，配偶不願替其當保人申請身分證或延長居留。即使大陸新娘已聲請核發保護令，仍無法憑保護令自行申請身分證或延長居留時效，被迫返回大陸，導致母子分離。

此外，有部分大陸新娘到臺後被轉賣到色情行業從事賣淫，其是否預先知情可能被迫賣淫值得注意。根據臺灣媒體的報導，普遍認為以「假結婚真賣淫」的大陸新娘，大部分原本就是大陸沿海等地的酒店小姐，來臺只是重操舊業。這種說法是否有根據，也有待進一步瞭解。但這樣的說辭，往往掩蓋了部分無知婦女，被兩岸仲介業控制被迫賣淫的不法事實。希望兩岸政府合作打擊不法買賣婦女的人蛇集團。

兩岸婚姻中，仲介業者扮演了一定的推波助瀾作用，其中許多不法的行為與問題的出現，都與這個行業不符合事實的仲介有關。針對仲介行業的人口販賣與欺騙不實的介紹，政府相關部門應積極加強監督與管理工作。

## 結論

九〇年代以來，在全球人口流動潮中女性移民日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大陸新娘正是這股全球人口遷徙下的產物。一九八〇年以

來，隨著臺灣地區及包括日本在內的亞洲新興國家的經濟發展，亞洲婦女投入勞動就業市場的人數逐漸增加。由於傳統的家庭勞動的性別格局並未改變，而本地勞動力的缺乏及昂貴，為了使得本地婦女可以外出工作，以應付生活開支的增加，因而轉向經濟欠發達的地區，向勞動力較低廉的地區尋找年輕女性，造成了大批女性的國際移動。這也反映了傳統的性別分工是如何的穩固。

亞洲移民勞工女性化不僅表現在女性勞工離開本國的人數急劇增加，同時還體現在她們在國外所從事的工作類型。她們多半面臨著一個性別分隔的勞力市場，從事如家庭幫工、病患以及老年照護、育嬰、旅館、餐飲、紡織、電子等生產線勞動（註二十九）。移民女性的另一個重要工作領域，就是為城市中工作的男人提供娛樂性服務。這都是傳統上被父權體制定義為屬於「女性化」的職業。

從本文所述，生活在臺灣的大陸新娘，無論「生兒育女型」、「老夫少妻型」及「假結婚真打工型」都符合國際女性移民勞工所扮演的「再生產」與「性勞動服務」的趨勢（註三十）。

「生兒育女」型的大陸新娘往往從事著傳統家庭婦女的工作：料理家務、照顧孩子和老人為主。「老夫少妻型」的婦女比菲傭更能提供全方位的服務——「家庭幫工、看護與性伴侶」三位一體的角色。有些老邁及貧困的臺灣配偶，甚至還要依賴大陸新娘打工來貼補家用。大陸新娘與其他亞洲新娘一樣，不僅被期望能生小孩、照顧年邁雙親，而且能從事農作，或是能在鄰近的工廠或商店賺取額外收入，亞洲新娘也因此被稱為是國外再生產勞動的一部分（註三十）。

一)。

長期以來，臺灣政府將照料小孩及老人的國家援助私領域化，基本上臺灣托育與養老的工作是以家庭照顧為主，因此托育與養老工作一直成為女性的責任。隨著臺灣人口老化及老人失能病患的快速增長，臺灣相應的照護體系並未建立。目前臺灣養護機構的數目嚴重不足，使得臺灣婦女必須相對承擔龐大的照顧責任（註三十二）。近年來由於大陸新娘來到臺灣，迅速地填補了臺灣老人看護勞動力的空缺。根據一九九四年臺灣內政部的調查，在兩岸婚姻中臺灣配偶六十歲以上的占調查總數的二一・二二%，換言之，在五對兩岸婚姻中就有一對是六〇歲以上的臺灣老齡先生通過迎娶大陸新娘的方式，來照顧他們的晚年生活。

大陸新娘的另一個重要工作領域，就是提供給在城市中工作的男人娛樂。以勇敢「打拼」，創造亞洲奇蹟的臺灣男性，與以「企業戰士」之稱聞名的日本男性一樣，他們的工作時間遠超過西方國家的男性，競爭的工作環境使他們處於極大的壓力之下，因此，他們需要包含性服務的娛樂業，作為他們工作緊繃之餘的補償或排洩口（註三十三）。事實上，從上個世紀五〇年代起，臺灣一直被視為男性觀光客的天堂。除了有登記註冊的妓院，還有許多特種行業作為掩飾的商業色情服務。這些行業包括觀光理髮廳、溫泉澡堂、按摩院、酒家、咖啡廳及餐館（註三十四）。臺灣色情業早在八〇年代就引進東南亞國家的女子來臺賣淫，當時由於成本低，也曾一度蔚為風潮。後來由於東南亞愛滋病氾濫，引起本地嫖客恐懼。於是兩地

人蛇，遂趕上兩岸通婚的「順風船」，引進「價廉物美」的大陸女子，讓她們進入缺乏年輕女性的性產業中工作。

換言之，大陸新娘進入臺灣的婚姻與勞動力市場，不僅解決了許多中產階級家庭老人看護、家務的工作，也使得在臺灣婚姻市場上處於劣勢的低收入家庭，老人看護與育兒的矛盾得以化解，因此，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臺灣婦女參與勞動力市場。

雖然大陸新娘承擔了長期以來由臺灣婦女擔任的生兒育女、照顧老人、家務勞動、性服務等工作。然而由於兩岸長期以來的政治對立，普遍造成臺灣社會對大陸新娘的刻板印象——「有錢的臺灣男人解救了貧困的大陸婦女」，以滿足臺灣在政治被打壓後的優越姿態。臺灣婦女普遍認為大陸新娘是「貪圖臺灣的榮華富貴生活而嫁到臺灣的」，或者是「來臺灣淘金打工賺錢的」，甚至認為他們是「爭奪臺灣先生的敵人」，將大陸婦女妖魔化為可以不惜代價爭奪臺灣男人的對手。於是出現許多婦女得知丈夫即將前往大陸而色變，甚至出現讓先生行前「閹割」的獨特現象。

長期以來，臺灣的女權主義者及婦女團體不僅在爭取婦女權益及解放，同時在促進臺灣社會的民主與進步上，一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她們在面對來自大陸的姊妹在臺灣所處的不利境遇及悲慘狀況時，卻由於僵化的意識形態的作祟，遲遲未能發揮女性主義者的姊妹情誼。

〔本研究係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九十一年度婦女議題研究案——少數族群婦女權益」的部分成果。這是作者與臺灣大學人口與性別研究

中心婦女與性別研究室的合作研究專案。本文的完成首先要感謝林維紅教授，從開始的鼓勵、支援到參與討論以及完成本研究。婦女與性別研究室的研究助理韓鈴與美惠提供了全方位的幫助。此外，海基會法律處、陸委會法政處、中華救總會、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民政局、及臺北市家庭暴力防治中心等單位慷慨予以相關資料，在此一併致謝。最後，特別要感謝的是，所有訪談的大陸新娘，謝謝你們的信任與友誼，把你們在臺生活的酸甜苦辣及生命中的血淚經驗，毫無保留的與我分享，使得本文最終得以完成。」

（本文作者為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北京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

#### ◎ 註釋：

註一：「大陸新娘」，是臺灣社會對這個群體的俗稱與通稱，是區別於「印尼新娘」、「越南新娘」等「外籍新娘」來自中國大陸的「新娘」，當然這些的通稱，掩飾了她們之間年齡、城鄉、地域、教育與職業的背景等的差異。

註二：外籍新娘部分，一九九四—一九九七年的部分參考王巨集仁《社會階層化下的婚姻移民與國內勞動市場，以越南新娘為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四一期，二〇〇一年三月，第九九—一二七頁。一九九八年到二〇〇〇年參考外交部領事事務局所簽發的配偶統計，詳見 [www.boca.gov.tw/public/announce/index.htm](http://www.boca.gov.tw/public/announce/index.htm)

註三：據臺灣海基會文書驗證處就兩岸通婚方面的統計，一九九三

年四、一六二對、一九九四年七、一七七對、一九九五年七、九二六對、一九九六年九、七一六對、一九九七年一二、一一五對、一九九八年一五、〇一四對、一九九九年二一、一六五對、二〇〇〇年二六、四七四對、二〇〇一年三二、四三八對，至二〇〇一年底已經累計驗證了一三六、二一四件對的婚姻類公證書。資料由臺灣海基會法律處提供。對此有必要補充的是，在二〇〇〇年以前海基會統計的婚姻公證書包括結婚和離婚，因此兩岸結婚數比文書驗證的總數要少。但由於在民國八十二年四月廿七日（一九九三，四，二七），辜汪會談於新加坡舉行並簽訂《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定》之前的文書驗證工作不在此範圍內。此外，考慮到少部分兩岸婚姻並沒有登記驗證。因此就以驗證的總數為兩岸婚姻大致的資料。

註四：有關產生大陸新娘的兩岸背景，請見拙文《全球化下的亞洲婦女遷徙—大陸新娘在臺灣研究》，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九十一年度婦女議題論文發表會—少數族群婦女權益探討研討會》，二〇〇二年十一月一日。

註五：戴著有小國旗的運動帽，踏著運動鞋，身穿夾克，講話帶有沈重鄉音的國語是他們的識別標記。「老芋仔」是人們私底下給他們的稱呼。大廈管理員、學校工友、清潔隊員、拾荒者是他們常做的職業。

註六：胡臺麗，《芋仔與蕃薯—臺灣「榮民」的族群關係與異同》，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六九集，第一〇七—一二三二頁，一九九〇年。

註七：賴錦慧，《性別／族群／階級交織下的婚姻與家庭：與榮民通婚的原住民女性》。

註八：姜思章，《怒吼：一個老兵的歷史證言》，一九九四，賢志出版社。

註九：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中華民國八十六年臺閩地區老年榮民狀況調查報告》，一九九八年。

註十：同上註。

註十一：《八十六歲榮民得子，兩岸老少配傳臺訊》，世界日報，二〇〇一年八月二日。

註十二：《中國人口年鑑一九九五》，中國統計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第三三七—三三八頁。

註十三：這裏需要說明的是，這個詞在中國大陸的用法中有不滿於現狀，希望不斷改善自己生活與狀況的含義，與臺灣有出入。

註十四：國衛頻道大陸新娘廣告詞。

註十五：自立晚報廣告欄。

註十六：二〇〇一年三月在福建的採訪。

註十七：筆者於福清調查時，訪談了一些想到臺灣打工的婦女，其中包括五〇多歲的婦女，她們都聽說臺灣好賺錢，問她們到臺灣可賺多少錢？她們回答在臺打工每月可得六、〇〇〇—一〇、〇〇〇人民幣，其實這與實際的情況有很大的出入。

註十八：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查獲大陸及港澳地區人民合法入境與國內非法工作或活動情況調查表》，二〇〇一年。

註十九：同十七。

註二十：自由時報，一九九八年十月二日。

註二十一：《大陸新娘，八成來賣春》，中國時報，二〇〇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註二十二：《大陸新娘，八成來賣春》，中國時報，二〇〇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員警勾結雞頭火拚內幕》，壹周刊，二〇〇一年十月四日，如壹周刊到臺灣賣淫的大陸女子百分之八十都從事過色情行業。

註二十三：· <http://www.ecpat.org.tw/indexc.htm>. ECPAT 係 The 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end Child Prostitution in Asia Tourism)。

註二十四：同註十九。

註二十五：最近對低收入家庭戶有所放鬆。

註二十六：中時晚報，二〇〇一年八月一日。

註二十七：由於調查物件是已經在臺定居的大陸配偶，因此允許工作。

註二十八：同註十四。

註二十九：Stephen Castels and Mark J Miller, 「The Age of Migration-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rden World」, 1998.

註三十：松井矢依，《全球化時代中亞洲國際移工的女性化》，亞洲勞動快訊第三期，一九九八年。

註三十一：松井矢依，《全球化時代中亞洲國際移工的女性化》，亞洲勞動快訊第三期，一九九八年。

註三十二：根據臺灣主計處的調查老人失能病患中，只有八．六三％住在療養院，二．一八％有能力僱人看護，其中八三．七五％失能病患是由家人承擔照護的責任，而所謂的家庭照護絕大部分的責任是婦女。一引自「胡幼慧，解讀臺灣長期照護體系神話」，收錄於劉毓秀主編「女性國家照顧工作」，一九九七年，女書文化，臺北。

註三十三：松井矢依，《全球化時代中亞洲國際移工的女性化》，亞洲勞動快訊第三期，一九九八年。

註三十四：成露西，《婦女、外銷導向成長和國家》：臺灣個案，《臺灣社會季刊》，第十四期，一九九三年三月。